

杨俊生的家,在广安市岳池县老干部局宿舍最里侧的三单元四楼。推开门,不到80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,褪色的地板擦得发亮,茶几干净整洁,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幅幅书法格外醒目。

99岁的杨俊生听见动静,拄着拐杖从里屋走出来。他的腰背像棵老松般微微前倾,但脚步依然稳健,精神依然矍铄。

78年前,21岁的杨俊生在战火中入党,后被捕入狱,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,1949年终以“未决政治犯”名义获释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前夕,这位党龄78年的老党员向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讲述了尘封已久的革命故事。



杨俊生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采访。 杨学军 摄

1

煤油灯下的誓言

1947年11月,一个平常的日子,在岳池县小南街一间屋子里,21岁的杨俊生站在党旗前,紧握拳头,一字一句地宣读着入党誓词,煤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。他的介绍人兼同学刘毅站在一旁,眼神里满是欣慰。

“我出生于岳池县一个贫苦家庭,小时候,家里靠租地主的田地维持生活。”回忆起那个时候的场景,杨俊生眼神有些恍惚。那时,不仅要给地主交粮,还要给国民党交税,总是吃不饱、穿不暖。

20岁左右时,杨俊生在岳池一中读书。“在学校,我遇到了当地的共产党员,听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愿景。”那个时候的杨俊生,喜欢看《大众哲学》《社会发展史纲》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,和同学刘毅一起研读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。

受益匪浅后,他经常参加学校的革命活动,编墙报、写新诗,用“匕首与投枪”向着黑暗的旧社会投刺。同时,他也产生了找到党组织的念头,“那时候我心里就明白,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!”

1947年到1948年上半年间,已是党员的杨俊生和战友们一起,积极响应地下党的号召,参与“一倍一”行动(即一个党员拉一个新党员),努力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。

为了吸纳更多入党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,杨俊生服从组织安排,到阳和乡一所学校执教。“我与学校几名老师建立感情,给他们做思想工作,宣传党的思想,最后把10名老师都发展成了党员。”杨俊生说。

后来,这几名地下党员都不幸被捕。无奈之下,杨俊生回到县城。

渣滓洞幸存者、99岁老党员杨俊生：

『只要我还能讲，就要把革命故事讲下去』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



2007年,杨俊生在岳池县九龙小学宣讲革命故事。 岳池县委组织部供图

2

渣滓洞里的抗争

2024年10月,重庆歌乐山渣滓洞,杨俊生站在院内,眼前的场景逐渐与他的记忆重合。

1948年7月,起义失败后,杨俊生与罗仁杰、张元平、刘耀文在撤退途中被乡丁围捕,“当时我们刚躲进一处农家后院,三十多个乡丁就端着枪冲进来。”杨俊生说,他们被押解的路上,碎石子硌得脚底生疼。四人边走边咬着牙商量:“没证据,就死扛到底。”杨俊生给自己改名“杨玉华”,把年龄从22岁说成18岁。

由于缺乏证据,1948年8月,四人被作为“未决政治犯”转押至重庆渣滓洞,与同期被捕的30多名起义人员一起被关在楼上七室。

当年8月17日,杨俊生对这个日子记忆深刻。转押渣滓洞那天,铁门吱呀一声打开,铁锈味混着腐臭扑面而来,每个10平方米的牢房要塞11人,昏暗的灯光下牢房又臭又潮湿。

“伙食叫‘五世同堂’。”杨俊生伸出满是褶皱的手比划着说,“蔬菜连根煮,胡豆数着粒分。豆芽汤稀得能照见人影,就着泡饭,都吃不饱。”

他一边说一边卷起裤腿,脚踝处扭曲的疤痕在日光下泛着白,“新镣铐磨得血肉模糊,后来大伙用布条吊着链子走,以此缓解疼痛,每走一步就提一下。”

很多事情杨俊生已记不清,但狱中两次抗争,他记得很清楚。杨俊生说,第一次是为抗议“五多饭”,饭里谷子多、稗子多、炭粒多、石子多等,每次吃饭需要自己去挑掉,等挑完了,饭已经变得又冷又硬。

为了抗议,大家集体绝食。由于担心出事,最终特务允许大家自己筛米。“我们男牢几个同志轮流筛筛子,终于吃上筛过的谷米饭。”杨俊生说。

第二次,是1948年12月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举行的追悼会。当年11月,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长期受刑和恶劣的监狱条件,在渣滓洞六号牢房病逝。难友们向狱方提出举行追悼会,却遭拒绝,“监狱没有这个先例”。

消息迅速传遍各牢房。大家秘密联络,通过放风时丢纸团、取水池传递消息,甚至借助潜伏在伙房的地下党员肖忠弟,在分饭时暗中递送情报。

杨俊生说,渣滓洞最利于集体斗争的,依然是绝食抗议。绝食第三天,狱方被迫妥协。

追悼龙光章那天,草纸扎的白花在铁窗下晃动,女同志们撕下裙摆缠在手臂上,男人们扯着衣襟写挽联:“是七尺男儿,生能舍己;作千秋雄鬼,死不还家”。追悼会上,全体难友肃立默哀,三鞠躬后齐声宣读祭文。随后,低沉而坚定的《国际歌》在渣滓洞回荡。

“渣滓洞的酷刑令人发指。”说起老虎凳、烙铁、钢针,杨俊生的声音仍有微微颤抖。1949年初,杨俊生等11人终以“未决政治犯”名义获释。

3

四楼上的坚守

5月中旬的岳池,暑气初显。99岁的杨俊生拄着拐杖,慢慢挪上老干部局宿舍四楼的台阶。

有关部门曾想将杨俊生的房子调换到一楼,却被他拒绝了,“党和组织给我的照顾够多了,我现在还能上楼,就不添这个麻烦!”

这句话,他说得很轻,但字字如铁。

1949年,从渣滓洞活着出来的杨俊生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党组织。重庆的街头还贴着通缉令,他辗转联系上地下党,只说了句:“说好了跟党走的,挨打受苦算什么。”

此后的七十多年,杨俊生始终坚守着当年的承诺。离休后,他和自己约法三章:一是终身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;二是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;三是遵纪守法,带头遵守党章,永远保持

共产党员的本色。

1950年初,杨俊生参加岳池县青年干部培训班,很快成为培训班骨干。培训结束后,他被分配到南城镇当工作组长,负责清匪反霸、发展生产等工作。后来,他曾到9个乡、15个村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基层干部。

“那个时候,我组织修建郑家水库、修水池、植树造林,带领大家同甘共苦,高标准完成任务。”杨俊生说。几十年来,郑家水库持续为周边农田提供灌溉水源,如今因环境优美而成为人们的休闲场所。

1982年离休后,杨俊生先后担任岳池县离休支部宣传委员、岳池县老干部自管委员会主任,积极组织老干部“自学、自管、自教”。老干部们有时聚在一起,难免有人抱怨。杨俊生不急不躁,只说“看看咱们当年是怎么过来的”。

4

革命故事的宣讲

在杨俊生的离休生活里,革命故事宣传和红色基因传承,成为他的“主业”,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。

杨俊生的家里,最显眼的是一张堆满资料的书桌。不会用电脑,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;眼睛花了,就举着放大镜看。草稿纸摞得老高,上面贴满修改的小纸条。

杨俊生很少用宣讲通稿,他总是针对不同对象准备各有侧重的宣讲手稿。

2021年“七一”前夕,杨俊生接到为广安市理论学习中心组上党课的任务,为了把稿件打磨得更加精炼,直到宣讲前一天深夜,他还在修改完善。

每每党的理论有创

新,他也总能紧跟时代步伐,融入宣讲内容。

自1982年离休以来,杨俊生宣讲红色故事850余场次,受教育者累计超过5.6万人次。

曾有人询问杨俊生为什么这么热衷宣传红色故事,杨俊生回答说,“我们这一代人,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,经受过生与死的抉择。我们经历过的苦难,不希望下一代还要继续。现在我离休了,能做的就是讲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,讲好党的故事,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。”

“尽管我现在走路要靠拐杖,但只要我还能讲,就要把革命故事讲下去,哪怕只有几个人,也要去讲。”杨俊生告诉记者。